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典藏本

[美] 魏斐德 著

Frederic Wakeman, J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君如 等 译



013065831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A84

141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典藏本

[美] 魏斐德 著

Frederic Wakeman, Jr.

李君如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A84/141



北航

C167436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典藏本/（美）魏斐德著；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ISBN 978-7-300-17636-9

I. ①历… II. ①魏… ②李…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①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980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典藏本

[美] 魏斐德 著

李君如 等 译

Lishi yu Yizh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插页 3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63 000

定 价 8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北航

C1674363



#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冷 溶 逢先知 龚育之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忠杰 李君如 章百家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牛大勇	冯筱才	朱学勤	任剑涛
许纪霖	<u>杜 蒲</u>	李向前	杨奎松	宋新宁
沈志华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u>高 华</u>	黄嘉树
萧延中	韩 钢	景跃进	程 农	

## 出版说明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颇富个性的诗人。鉴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鉴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数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之“现代性”和比较政治学的宏观视角上，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毛泽东研究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这套“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首先旨在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同时也期望为人们进一步审视和反思 20 世纪人类的“现代性”过程，提供一个侧面的资料支持。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心合作的科研出版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诸位专家，为本译丛的持续和拓展做出了大量建设性的贡献。秉承学术研究的基础准则，我们注意精选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影响，持论公允、论说严谨的研究著述。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论证的学术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也在选择范围之内。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作者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专家，他们慷慨允诺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是促成此一国际学术交流盛事的基础要素。国内各位权威专家慨然允诺担任译丛的顾问，是对我们译介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审读专家们对选题和译文所提出的多方面的修改意见，也是译丛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译丛翻译出版的专家、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敬意和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均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核校；凡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以及特定条件的局限所带来的问题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编委会

2013年8月

## 中文版序

我怀着欣喜和感激的心情看到李君如教授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的新译本，他将英文版精当地译为中文。这本书最早的英文版是30年前发表的，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在激烈地进行。那时，作为一个被毛泽东的超凡魅力，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吸引的西方学者，我感到有必要弄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了达到“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是怎样和他自己组织中的对手形成敌对的。

不可否认，毛主席做出这种决定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但是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革命思想的意识形态源泉；当然，中国传统和现代思想的某些哲学内容对他个人世界观的影响，将使我能够更好地了解他在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的斗争中所体现出的决心。对我来讲，这一深思熟虑后的目标就是概括出毛泽东思想中最大胆、最有独创性的方面，即一种构成他革命实践理论创新性的特征。

当时，《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是一本在美国史学界颇具争议的著作。尽管它曾被提名国家图书奖，但是因为哲学分析太多，而对这位主席个人兴趣的强调却很少，而遭到批评。毛主席自己也承认，他个人不得不防止党内位居一线的领导阶层成为“走资派”。批评家认为《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这本书过于抽象和充满空想色彩，在作者寻找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连贯性的过程中，并没有注意到非常现实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兴趣的



因素——更不用说这位主席自己的反复无常了。

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局外人已经对影响了如此多人生活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的反复无常有了很多的了解。因而，这些年在外国，毛主席的声望并不像以前那样高。但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在 20 世纪全球历史中的地位。这本书只是一项初步的研究，我真诚地希望它的再版能够为仍在持续的关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最终定位的争论做出一定的贡献。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2003 年 10 月于伯克利

## 译者的话

《历史与意志》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教授（Frederic Wakeman, Jr.，曾译为弗里德里克·韦克曼）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一部影响甚广的著作。我和我的同事、朋友曾在1991年把它译成中文，于1992年3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这次经过校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在内部发行时，书名译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历史与意志》这次按作者原著的书名《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译为《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魏斐德教授对中国明清和近代的历史及思想史有较深的研究，所著《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叛乱与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研究》等书曾在美国中国学学者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或许正是这种一般外国学者难得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养，使他能够以与众不同的视角，涉足毛泽东研究领域。本书讨论的主题既不是毛泽东的理论观念本身，也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而是作者所谓的毛泽东的“知识环境”。

作者之所以要研究毛泽东的“知识环境”，是因为他在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时，碰到了困难。他用“意想不到”四个字，来表达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直观感受。他说：“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

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泽东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确实，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难题。世界上被称为“革命”的历史事件，都是被统治者推翻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世界上的统治阶级都竭力维护自己的政权，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是自我革命，自己推翻自己建立的上层建筑的“革命”。所以魏斐德教授感到“意想不到”，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空想”。他坦诚地说：“我觉得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位20世纪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而且，他也研究了施拉姆、陈志让、迈斯纳等著名学者的意见，认为他们的看法，比如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着“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等等，都不能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要正确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对毛泽东的知识环境做一番透彻的考察，运用由一系列曾对毛泽东产生过种种影响的理论观念构成的一组透镜，对其思想加以分离和解析。

那么，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知识环境”包括哪些内容呢？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以“思想的转变”为题，叙述了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接触和学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近代康有为的思想；第三部分以“自由”为题介绍了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过程中，通过老师杨昌济学习和接受新康德主义的经历；第四部分以“必然性”为题，指出在十月革命后毛泽东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仍保留着新康德主义对个人意志的崇尚，而且最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考茨基和柯卡普介绍的社会主义学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论述毛泽东的知识环境与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强调的主要是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见解。而且，作者认为这一“知识环境”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特别是影响了毛泽东的晚年。这样，作者不仅没有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样一些毛泽东在晚年的理论失误加以区分，而且把这种理论失误当成毛泽东思想本身或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经过研究，魏斐德教授的结论又是什么呢？他认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确实与那些“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的指示”不一样，而且最终结果还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他强调：“毛泽东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魏斐德教授要把这部著作定名为《历史与意志》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哲学透视，透视到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全部哲学，就是他处理历史与意志矛盾的辩证法。

这样，魏斐德教授就可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作出他的解释了。他说，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就已经觉察到，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权力可能会破坏他的同志们的革命纯洁性”。在这一历史与意志的矛盾中，毛泽东希望求助于社会本身，发动群众来解决这一矛盾。魏斐德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历史（官僚政治的规范化）和意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发生的“戏剧性的冲突”。而毛泽东解决这一矛盾的辩证法，即用反映社会历史要求的意志来改变正在发生的历史。他说，这种辩证法“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实际上，魏斐德教授认为这种辩证法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更富有弹性和灵活性。他在全书第一部分用“蒙太奇”作标题，剪辑了一些重要镜头，如“革命奠基人”、“红太阳”等，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革命家或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由他的思想所表现的人格面具”。由于毛泽东的意志是与历史一致的，所以能决定历史。魏斐德教授在全书结尾时，对毛泽东的辩证法作了一个总结：“与历史并驾齐驱，决心与它斗争，也就是在理解历史的需要时承认它。毛泽东通过设置对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战胜强大敌人的革命者，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明主席。”“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他认为这种历史与意志的矛盾辩证法，才是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谜的一种较好的解释。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个重大的学术课题，本身无可非议。无疑，我们要重视魏斐德教授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分析和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启迪意义的，不乏真知灼见，但我们必须指出，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主客观方面存在许多不利条件，作者的研究视野必定会受到很大局限。从主观方面看，多年来，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存在一种倾向，即力求从思想史的角度，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轨迹和深层结构中挖掘出必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心理定式”或内在逻辑。魏斐德教授虽不满足于某些粗浅的解释，想通过对毛泽东知识环境的剖析拓宽研究的视界，但他的基本意图仍旧是从毛泽东的思想本身寻找“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没有超脱出上述一般倾向的窠臼。更重要的局限是在客观方面。本书出版于1973年。当时，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置身其中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普遍把它当成社会主义革命深化的合规律性现象，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氛围中，根本不可能形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分开来的科学认识。置身局外且处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外国学者，当然更难以窥透底蕴。应当说，这是历史进程本身给人们的认识造成的障碍。我们不想因此而苛求作者。

但是，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在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的历史局限，毕竟会使本书在具体问题上广博的引证和独到的分析为之减色。我们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更感觉到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继续革命理论”这样两个基本概念的重要性。

今天人们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偏颇估计、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产生误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不同构，是脱离毛泽东思想正常发展轨道的产物。因此，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很难找到“继续革命理



论的基因”。但是，作者既然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然面临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不应是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在长达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又找不到有足够分量的证据。于是，唯一的办法是把探究的视野往前推，一直推到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实际上，魏斐德教授考察的知识环境主要正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接触的各种思潮。

毛泽东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青少年时期积累知识、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思想学说，甚至一度信奉过某些“主义”。这并不奇怪。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观念中，当然不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糟粕。如果对其做抽象的哲学分析和表面的比较，不难在其中发现某些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相通的东西。可以说，作者的视线之所以在青年毛泽东与晚年毛泽东之间不断地跳跃闪回，正是为了揭示二者之间蛛丝马迹的因果联系。似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是一个早年接触过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观念，经过几十年的潜伏期，最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得到显现或回归的过程。似乎这一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或主要线索。

这显然不符合基本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一，它的前提是否认毛泽东的思想在1920年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即在清理批判当时所受各种思想影响的基础上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这一决定性的思想转变，根本不可能对毛泽东此后几十年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其二，它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过程置于研究视野之外，而这一过程恰恰正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样一来，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经历中就出现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断层。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思想发展中出现这样一种断层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书中并未就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三，即使假定在毛泽东早年知识环境同“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间存在某种藕断丝连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在几十年的断层时期采取什么表现形态、以何种方式维系着并发挥作用，这也是应当加以阐明的重要内容。但是，书中并未提供具体的文献资料和明确的分析论证，有的只是一些暗示和联想。这显然不充分。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比较零散”，希望人们“自己能把这些知识的片断综合起来”。其四，如果认定“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主要是在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环境之中，随之产生的问题便是，这些长期潜伏的思想要素为什么偏偏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显现出来，而不在此前任何时期发作起来？显然，脱离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特定条件的具体分析，单纯在思想史领域中寻根溯源，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指出本书基本思路中存在的缺陷，并非是要完全否定它的学术价值和其中蕴涵的有见地的思想。对于这样一部涉及重大课题的学术著作，读者尽可见仁见智，做出自己的评价。只有在这种思想交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才可能逐步深化。我们在这里不揣冒昧，将翻译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初步看法陈述于此，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本书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英文原版译出。书中引用的文献资料，凡有国内中文版本的，均以中文版本的文字为准进行核校，并只注中文版本出处；无中文版本或个别查不到中文版本出处的引文，仍注英文原版所注出处。对于书中文献史实的不准确之处，没有逐一以编译注的方式指出，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引用书中文字时，务请核对原文。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施肇域（前言，第2、3、5章，第4、6章部分）、田松年（第1章）、李炳勇（第4、6章部分）、李仲如（第7~10章）、张彩云（第11~13章）、孙慧娥（第14章）、钱宏鸣（第15~17章）、李君如（第18章部分、第19~20章）、张勇伟（第18章部分）。全书译文由周林东校订。在本书新版整理过程中，发现了若干笔误和少数错译、漏译的地方。由主编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都静，根据英文原著对修改后的译文

再做了校订，并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逐一进行了重校，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和都静同志，表示谢意。

李君如

2003年10月2日夜于朝鲜平壤高丽饭店

(在1991年4月“编者的话”基础上改写而成)

## 前 言

像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一样，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震惊。当消息流传到外界，当朝日新闻记者们开始报道那些大字报，当被捆绑的尸体沿珠江漂流至中国香港，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一半由于信息不通，一半由于缺乏洞察力，我们对这些纷乱的事实不能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后来，事态渐渐明朗化，人们才了解到，毛泽东已发现并宣布了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1966年7月，他命令党的书记们亲临北京大学去经受这场“文化革命”。“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sup>[1]</sup>毛泽东对一些在1935年跟随他从江西到延安的干部们说，这些在国内战争很久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更有战斗力的革命者。毛泽东宣称：“闹事就是革命。”<sup>[2]</sup>

至少对我来说，这类话是意想不到的。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泽东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

也许因为我对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所知甚少，我觉得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位20世纪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诚然，其他学者，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陈志让、莫里斯·迈斯纳，以及